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践

——2024年民族文学综述

□邱婧

少数民族作家们对地理景观、民俗元素、文化传统的书写,对新农村风貌、新农民形象、新农业模式的塑造,对宏大社会历史题材的叙事等,均显示出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的崭新面貌

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已经历了70余年的进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024年,少数民族作家们持续围绕各民族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题材进行创作,并从全球化、现代性的语境出发,对文化历史脉络及文学创作范式进行积极探索。少数民族作家们对地理景观、民俗元素、文化传统的书写,对新农村风貌、新农民形象、新农业模式的塑造,对宏大社会历史题材的叙事等,均显示出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的崭新面貌。与此同时,在民族文学话语场域中,文学奖项、文学活动、丛书和作品集的出版及学术研讨等,在不同维度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学成就。

关于自然与历史的丰富书写

人与自然的互动由来已久,在本年度的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作家在生态文学书写方面着力甚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对于自然的看法,且文化多样性较为突出。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散文集《去有风的地方》以游记形式,展现中国西北高地多姿多彩的山川河流、万物生灵和深厚独特的人文景观。作家以灵动细致的笔触,深情记录下自由顽强地生活在高原上的无处不在的动植物,以及当地独特的地质地貌,这些散文以跨学科的视野,展示了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再如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野色》,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以草原上的牧民和牧民放牧的一头牛等视角交错叙事,书写了充满灵性的草原生物的日常生与生命体验。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作品《夜鹰》延续了其儿童文学、生态书写的创作路径,展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哈萨克族作家阿克拜尔·米吉提的《巡山——阿克拜尔·米吉提生态文学作品集》收录了其创作的数十部与生态文化相关的小说和散文。普米族诗人鲁若尔基的诗歌集《小凉山歌谣》对小凉山的风物、自然与人民展开了充满温情的叙述。

在历史题材书写方面,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童年的回音》等诗作中,以童年和回忆的向度书写了纪念粟裕的诗歌,强调其为正义付出过生命和血的代价。藏族作家达真的《家园》跨越历史长河,讲述了桑文草原上两代人的生活变迁,作家从对平凡的人和事的叙述中,寻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如部分读者所言,通过一个小切口来展现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彝族作家英布草

心的《蜜山之上》采用一种超现实的风格,将文字与彝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民俗相糅合。

蒙古族作家海伦纳的《红色骑兵》延续了其革命历史文化题材的写作,在书写草原历史、展示草原文化生活细节的同时,最大程度复原历史本身。小说描写了一批拥护共产党的蒙古族进步青年,组成工作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引导蒙古族牧民农民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月月半,月月圆》以一个苗族乡村的陈年往事为切入点,用文化人类学的笔触绘制了一幅近代中国的边地景观,也强调了苗族地区在现代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黑洞》对广西的抗战历史展开书写,分别从不同视角切入一场残酷的保卫战。羌族作家羌人六的小说《尔玛传说》取材自羌族神话故事《取火种》(“燃比娃取火”),也是作者长篇小说《尔玛史诗》部分节选。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多样叙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融合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近年来的民族文学创作中,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相关的题材逐渐增多。作家们立足于农村变迁在时代发展大背景下的现实问题,叙述农民在思想观念和心理上的转变以及农村在现代化推动下的新变。比如,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常山战鼓》设置了男主人公学习打鼓、参与乡村建设,并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战鼓”登上央视春晚的故事,其笔下的乡土故事围绕作为文化遗产的战鼓的传承与振兴展开。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说《冬天到东北来放羊》将叙事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东北边疆社区区域内,特木尔带领草原上的羊群跨越地理空间,穿越陈巴尔虎草地,随即越过大兴安岭,最终抵达黑龙江,度过漫长的冬季。在东北,牧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组成了新的经济和生态共同体。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小说《天边的月亮湖》是涉及易地搬迁的现实题材创作,主人公扎西东珠及其家人经历了搬迁,也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告别。全书贯穿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理念,人与动物、植物、天气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家园的热爱与别离后的新生,都是作者试图表达的主题。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上岭网红》书写了一个自在自在地地理观念——广西上岭发生的故事,当主人公被网络上的言论淹没时,他开始重新思索人与自然、虚拟网络和现实中充满温情的乡村生

活之间的关系。壮族作家陶丽群在《自留地的瓦屋》中,讲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乡土故事。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长篇小说《风过五龙》书写的是其本人的驻村经验,他以驻村第一书记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度介入辽宁西部的乡村现场,从历史、现实等诸方面进行观察。满族作家伊尔根的长篇小说《宝山故事》开头就讲述了一起上访事件,在拨开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后,塑造了一系列乡村精英的形象。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频繁交往互动,这恰恰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为增强。关于这一点,也在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集中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书写中。回族作家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围绕乡村振兴主题,通过讲述马一山、祖祖、舍娃等一家五口的人生命运故事,表现乡村生活经验,真实描绘西海固人民脱贫的生活场景。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白色猛虎》设置了一个家庭旅馆的空间,通过儿子和女友的归乡与别离,探讨人的相处和母性的坚毅。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在组诗《消失的村落》中,描写了甘南卓尼故乡的村落变迁,书写故乡的人与事,以及藏族民众的精神生活。此外,还有回族作家马泉泉的《梦幻电梯》,展现了家长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孩子对自我空间的渴望与争取之间构成的困境;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36号道班》讲述了一个司机如何缅怀多年前在道路遭遇塌方时掉进大江中的奉献者和奋斗者;土家族作家陈刚在《桥庄古歌》中着重提到土家族古歌的历史传统,以及新近为乡村创新和传承民族文化做出努力的人们。

在对现实的书写上,作家们以各具特色的笔墨,展示出普通人复杂多样的精神世界。比如蒙古族作家肖龙的《我是一棵榆树》、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牛皮绳上铃铛响》、彝族作家李美桦的《祝你好运》、云舒和满族作家白晓兰共同创作的《三郎的雪山》、壮族作家黄爽的《檀木长桌》、藏族作家阿郎的《马尔康人物志》、苗族作家曾令莲的《英雄帖》、蒙古族作家陈晓雷的《琴河流过草原》、苗族作家向本贵的《迎风苑的三家房客》、满族作家王喜平的《房产中介》等,均关注和书写了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丛书出版中的民族气象

中国作协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旨在发现培养各民族优秀青年作家,推出民族文学精品力作,

持续推动各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2024年度项目共入选了10部作品。畲族作家洛施以自身在老竹畲族镇的成长经历和“畲文化”为灵感,拜访当地文化馆、博物馆和非遗传承人,创作出长篇小说《畲山》;水族作家王刚的《为你种一棵树》包括7个中篇小说,立足贵州本土,取材自贵州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围绕要猴人、侗戏、民族地区修路、民族文化坚守等主题展开书写;白族作家北雁的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群像》展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教师、驻村干部、退役运动员、扶贫干部、乡镇文化讲解员、返乡创业大学生等工作者形象;壮族诗人牛依河的诗歌《重叠的事物》书写了喀斯特群山环绕、红水河穿越而过的桂西北的人物与生活;回族诗人马永霞的诗集《桑树上的迁徙》对吐鲁番市鄯善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的生活场景展开书写,以“桑树”为切入点关注社会变迁;满族作家宋雨薇的纪实散文《别一种叙述》书写了东北大地微观的个体命运,对乡村的现代性展开思考;藏族作家雍措的散文集《消失的故事》以一座朴素的小山村山村村为写作背景,书写藏族地区的山乡巨变,“消失”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消失,而是一种新的生长和重生。回族作家郭乔的中短篇小说《银凤凰》、侗族作家石庆慧的中短篇小说《美丽人生》、藏族诗人城鸥的诗歌《古海·高韵之地》也同时入选。

本年度涉及民族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型项目是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项目设置了“奋进新征程,书写新史诗主题专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专项”“新时代文学研究主题专项”“写作和出版计划”等分类,入选的少数民族作家有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等,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作家的实力和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的出版也十分亮眼,该作品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为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作出贡献。丛书收录了8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和1位作家的散文小说合集,包括鲍尔吉·原野、石舒清、梅卓、潘灵、肖勤、黄佩华、于晓威、马金莲、陶丽群的作品。

此外,本年度地域性的文学丛书也成绩斐然。比如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里是新疆”丛书,多位新疆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新疆及各族民族文化,丛书共16册,包括刘亮程主编的《木垒的眼神》、熊红久散文集《绿草无边》、段蓉萍散文集《在菜籽沟醒来》、李枝荣报告文学《胡杨的微笑》、堆雪散文集《出天山》、方如果美食散文《大盘鸡正传》、艾贝保·热合曼散文集《我的芦苇沟》等。又如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多彩

民族文学书系”第1辑,多部作品展现了贵州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40周年文学回眸》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多民族的文学书写展示了鄂西文学的特色。

积极推动民族文学繁荣发展

在文学奖项方面,2024年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颁发。和以往一样,本届“骏马奖”的评选奖掖了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大大推动和激励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生产创作。获奖者既有早已活跃在汉语文坛的知名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近年来在民族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译者。文学奖项的颁发,对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鼓励和推动作用。除“骏马奖”外,本年度的奖项还有很多,如首届天山文学奖、首届《五指山》文学奖、第五届青稞文学奖、第七届西藏穆朗玛文学艺术奖也纷纷颁出,遴选出高质量的多民族文学作品。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之中,出现了更多新题材、新思路,因此在当下研究中也关注新的议题,研究者和文学现场的互动不可忽视。本年度最为集中探讨民族文学创作的学术活动,当属在贵阳举行的“新时代民族文学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参会的100余位学者将民族文学研究的主线聚焦在理论研究、话语研究、路径研究等层面。年会彰显了当下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多重面向,包括民族文学史料及文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学创作研究、口头诗学研究、交叉学科与民族文学研究等议题。这些思想的交锋和探讨,以其丰富而多元的特征,诠释了我国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新走向。

另外,值得一提的学术活动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内蒙古大学主办的“民族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度探究”“多媒介、数字人文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等议题,深度探讨民族文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独特作用与多重价值,探究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实践路径。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记录民族交融,文学有何独特优势?

□陈莉

且对夷族礼制十分精通,长相也有胡人特征,有可能是胡汉混血儿。李白的诗歌中有众多对西域器物、西域音乐、西域舞蹈和胡人生活状态的描写,如《少年行·其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首诗把长安少年风流倜傥、任性潇洒的生活状态和长安城中胡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景象都呈现出来了,读来真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卢纶的《塞下曲》写道:“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在塞外辽阔的穹幕下,庆祝胜利的宴席已经摆好,羌族人和唐军共同庆贺,还没来得及脱下铠甲的将士们带着微微的醉意翩翩起舞,歌舞声在山谷间回旋。整个场景充满了胜利的豪情与民族团结和睦的喜悦。从唐代文学文化交融的状况来看,当时的诗人对国家民族有着高度的自豪感,在他们眼里天下国家一体;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蛮夷和华夏的鸿沟,他们的诗歌寥寥数笔,却将唐代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历史观念生动呈现出来。

再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祖先是满洲八旗人,他的族籍是满族,他的母亲是汉族。曹雪芹以这样的文化身份,对清代社会民族文化融合的状况做了最为细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中的人物,居家便服多为汉装,而社交礼服则偏重满服。《红楼梦》中写到的粽子、包子等都是满族食材,糖蒸酥酪、萨其玛等是满族传统食品,火腿炖肚子、胭脂鹅脯、酒酿清蒸鸭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等则是汉族珍馐。作为一个多民族血统融合的知识分子,曹雪芹不分彼此地将清人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写了出来。这是我们在史书中看不到的文化细节。

在这片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土地上,汉文化的影响力固然更大,但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融入,却常常是汉族文学焕发生命活力的契机。每个朝代都有作家因为种种不同的契机而在民族文学交流中获得新的创作题材,得到新的创作启示。比如明代诗人杨慎被贬云南后,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在西南边陲广泛结交各族名士,如白族文人李元阳、杨士云、董董、李东儒、金磊、纳西族文人木公、木高、木东,蒙古族文人章鹏,彝族文人左明理、左衽等均与杨慎有过交游,甚至有应酬唱和之作。杨慎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在交游过程中创作出来的,那里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比如纳西族木氏家族就有很深厚的儒家文化修养。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民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如果说古代作家大多是在无意间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为后人呈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一大批作家带着责任和使命,对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生息繁衍的过程进行了如实描写。如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闻捷的《天山牧歌》、王蒙的《这边风景》、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右岸》等一批优秀作品,向我们呈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也写到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达吉和她的父亲》将凉山彝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微观的视角呈现出来,从而将不同民族从冲突走向彼此接纳和理解的过程写得具体而生动;《天山牧歌》采用组诗形式呈现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有了更自觉的意识。

比起视觉艺术,文学能够深入到人物的精神

和心灵深处,将人物最为深幽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碰撞、交流的过程,民族文学理应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通过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作品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作家认识到了以民族文学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所有民族文学创作者必须面对的时代问卷。作家们用自己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跨越民族界限的故事,提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比如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在新疆农场长大的阿舍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混血儿。她的外祖父是来自山东的汉族,外祖母是新疆当地维吾尔族,父亲是湖南到新疆的知青,侗族,阿舍身上流淌着汉族、侗族、维吾尔族三个民族的血液。民族身份的多重性给了她成长的困惑,同时也赋予她更为开阔的视野。《阿娜河畔》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汇聚在新疆的农垦区,他们带来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形成多元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不仅丰富了边疆的文化生态,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通过藏人的视角,艺术呈现了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故事。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这样红》则描绘了跨民族的深厚情谊,颂扬了各族人民间的无私互助。这些获奖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情感和心理基础。借助于“骏马奖”的社会影响力,把这

些优秀作品推广出去,有助于让更多读者看到民族文学的新高度。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各民族的文化特色、风俗习惯等,打破民族隔阂和偏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

未来我们不但要打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深入挖掘和整理各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并欣赏到优秀文艺作品中不同民族的文化魅力,让心灵在文学的海洋中自由交流,同时还需要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继续用文学的形式展现新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展现这一过程中存在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今天民族关系的新特征。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作家能听到时代的召唤,用文学来反映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在中华大地上有不少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村庄,比如北京密云区的河西村、云南大理的郑家庄,都拥有7个以上民族,是典型的互嵌共居村落。对于不了解这些村庄的人来说,非常希望有人以文学的形式为我们呈现这些村庄民族杂居的历史原因和交往交融的故事。因此我们期待作家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尤其是那些身处民族地区、深入了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状况的作家,请拿起你们手中的笔,用真实的描写和独到的个人视角,把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记录下来,这将是另一个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